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特别策划

1931年至1945年,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。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引领下,广大抗日军民在种种不利条件下,与穷凶极恶的日寇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,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这场伟大胜利,不仅体现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,也体现在中华儿女在国家积贫积弱情况下,

运用整体上落后于日军的武器,依靠勇敢无畏与无穷智慧,构筑起抵御外侮的钢铁长城,最终击败了日本侵略者。

本期,让我们回眸抗战期间,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武器的来源、列装、使用情况,体会在当时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枪、炮、弹的来之不易,聆听枪炮声中的胜利回响,透视硝烟战火中的胜利之光。

枪炮声中的胜利回响

■王笑梦 苏健

枪型虽杂,屡创战争奇迹



八一式马步枪。



汉阳八八式步枪。



1891型莫辛-纳甘步枪。



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。

山西武乡,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内,有一处将八路军与日军武器进行对比的展陈,一边是八路军的步枪、大刀、红缨枪,另一边是日军的机枪、大炮。

这种对比,让“小米加步枪”的人民武装最终击败了“飞机加大炮”的日本侵略者这一事实,变得更加立体、鲜明。稍微留意就会发现,展出的这些八路军步枪型号可谓多种多样。

抗日战争时期,中国军队的武器五花八门,尤其是八路军、新四军、武工队等长期在敌后作战的抗日力量,所用枪械的种类更加复杂,既有外购的,也有战场缴获的,还有我国兵工厂设计生产的。

1891型莫辛-纳甘步枪,有不少是在抗战爆发前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的。这种沙俄时代设计的步枪,射速较快、射程较远、精度较高,因为在我国民间有一定保有量,因此抗日战争爆发后,很快成为抗日武装手中的利器。在淞沪会战、武汉会战中,多次阻击日军的苏联械师就配有这种步枪。后来,

八路军、新四军部分官兵也获得了这型步枪。1938年10月9日,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特务大队大队长武中奇带领第一支队,在淄川地区太河村附近击落日军一架低空飞行的“菲亚特”BR.20轰炸机,当时用的就是被称作“水连珠”的莫辛-纳甘步枪。

用步枪击落轰炸机,无论放到哪个历史时期,都属于战争史上的奇观。这种奇观的出现,既基于该枪较远的射程与集火射击方式,也源于当时指挥员的敢想敢战。回顾抗战史,不仅是这种民间外购的枪械,其他枪械到了人民武装的手里,作用也同样发挥到了极致。

“三八大盖”是抗日军民在战场上缴获最多的枪械。这种枪是侵华日军的主力步枪,射程较远。在太行山区作战的八路军第129师就缴获和配备了不少“三八大盖”,并用它取得很多战果。1938年,日军华北方面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一部进犯山西广灵,八路军第120师359旅719团1营教导员彭清云,远距离击中日军第2旅团团长常冈宽治,

用的就是“三八大盖”。

抗日武装拥有的各类轻重机枪,也主要靠缴获。如日本于1922年定型的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,因其枪托有明显弯曲,被抗日武装称为“歪把子机枪”。1942年5月14日,八路军第120师358旅716团伏击日军第69师团85大队和伪军共700多人,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并将其全歼,其中就有以前缴获的“歪把子机枪”的功劳。

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,抗日武装也从别处缴获了一些枪械,比如从英国在中国成立的矿警队手中获得了一些李·恩菲尔德步枪。1943年,在八路军路南一区队3连连长刘守仁动员下,53岁的裴天来被“特招”入伍,从此造就了一段令日寇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传奇。裴天来使用的枪就是李·恩菲尔德步枪,标尺射程1189米。使用该枪,裴天来一人就击毙日军130多人、伪军汉奸300多人。

中国的兵工厂也为抗日武装提供了不少枪械。不过,限于当时的条件,

中国的兵工厂大多以仿制他国枪械为主。如汉阳八八式步枪,就仿制自德国毛瑟1888式步枪。制作工艺提升后,改进后的新枪被称为“汉阳造”。与日军制式步枪相比,“汉阳造”在射程、精度方面处于明显劣势,但该枪易于维护、适配多种弹药,因此一度成为八路军、新四军部队的主要武器之一。平型关大捷中,八路军第115师伏击日军辎重部队,很多官兵使用的就是“汉阳造”。1944年末停产时,“汉阳造”及其衍生型号产量达108万支,其广泛使用奠定了抗日武装作战的装备基础。值得一提的是,即使是用“汉阳造”,抗日军民也创造出一个个奇迹——较早开始“麻雀战”的李殿冰,使用的枪械就是“汉阳造”,后来他成为令敌人闻之胆寒的神枪手。

不仅是步枪,中国的兵工厂还先后引进和仿制了捷克ZB26轻机枪、德制马克沁机枪等。前者被抗日武装亲切地称为“捷克造”,后者仿制品为民24式重机枪。对善于进行游击战的八路

军、新四军和其他敌后抗日武装来说,“捷克造”轻便灵活,能伴随步兵提供火力支持。民24式重机枪威力大,持续输出火力时间长,威力可以压制日军九二式重机枪,因此抗日武装一旦拥有就将其视同生命。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旅第13团就拥有一挺民24式重机枪,带着它南征北战,直至全国解放。

这一时期,各敌后根据地也建起不少兵工厂。在党的领导下,八路军军械科科长刘贵福吸收“汉阳造”“三八大盖”等步枪优点,考虑当时运动战、游击战、肉搏战以及骑马射击需求,设计出一支全新马步枪。该枪长约1米,枪管短而轻,后坐力较小,便于骑马射击,配有三棱刺刀,肉搏时能迅速脱钩甩出,刺杀效果也更好。新枪设计于1940年8月1日提交审定,被正式命名为八一式马步枪,随后在黄崖洞兵工厂量产。

此外,中国的兵工厂还仿制过美国汤姆逊1921型冲锋枪、德国MP18冲锋枪等。前者被称作“晋造汤姆逊”,后者被称作“手提花机关枪”等。这些枪械,也有一部分被投入消灭日寇的战斗中。

客观地说,抗日战争时期,中国军队枪械的总体质量无法与日寇装备的枪械相比,然而,凭借这些“万国造”枪械,抗日军民最终取得胜利的事实说明,有党的坚强领导,有抵御外侮、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,有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的力量,就会创造出一个个战争奇迹,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。

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,陈列着一张珍贵照片。照片中,几位勇士簇拥着一门大炮,大炮上写着:“八路军在大杨庄战斗缴获日军之山炮”16个大字。

这门山炮是1939年初第129师冀豫支队2团在宁晋县大杨庄战斗中从日寇手中缴获的。当时,前来“扫荡”的日寇300多人进驻大杨庄,所带武器中就有这种75毫米口径的山炮。时值寒冬腊月,2团派出突击队搞夜袭,在日寇察觉后一边战斗一边推着山炮出了大杨庄。

时任第129师副师长的徐向前得知此事后,专门派人去给夺炮勇士们拍了照片。日寇天亮后发现山炮丢失,出动了一支由2辆坦克和18辆汽车组成的部队来搜寻。此时,这门山炮早被八路军转移到安全地带。

徐向前专门派人给拍照,日军出动部队搜寻,两个方面情况都反映着一个事实:当时火炮很宝贵,对日军来说是如此,对八路军来说更是如此。

如果说八路军、新四军当时在枪械方面还能做到“勉强够用”的话,那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,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火炮方面几乎是一穷二白。据统计,1937年8月,红军改编为八路军、新四军时,官兵手中基本没有掷弹筒、迫击炮、平射炮、山炮等重武器。到了1940年3月,八路军仅装备掷弹筒108门、迫

火炮虽少,打出非凡弹道

击炮156门、平射炮9门、山炮38门。

纵观抗战史,八路军、新四军的火炮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、从仿制到研制的过程。这一过程中,抗日军民用不少火炮打出了非凡弹道。

掷弹筒可视为一种小口径的火炮,能够单兵携带,不仅射速较快,杀伤力也大,能够直接支援步兵作战。八路军早在平型关战役时就接触过掷弹筒,不但直接下发部队,还开始进行仿制。

侵华日军使用的掷弹筒有两种:大正十一年式掷弹筒和八九式掷弹筒,两者口径均为50毫米,前者有效射程较短,后者有效射程较远,杀伤半径5米左右。

在百团大战的关家垴战斗中,日军的掷弹筒对八路军战士造成不小伤亡。当时,登上关家垴的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,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:“敌人有掷弹筒,我们也必须有。”此后,八路

军兵工厂技术人员攻克种种难关,于1941年4月制造出第一批掷弹筒,被称为“50小炮”。后来,技术人员对掷弹筒进行了改进,使其结构更加合理。经实战检验,八路军兵工厂自制的掷弹筒比日军掷弹筒更好用。

提到抗战时期人民武装的火炮,就不能不提到迫击炮。由于缺少大口径火炮,八路军、新四军所属部队能依靠的炮兵火力支柱就是迫击炮。和大口径火炮相比,迫击炮炮体较轻,便于携带,能够很快部署展开射击。同时,迫击炮弹道弯曲,炮弹威力不小,尤其适合在山地使用。也正因此,82毫米迫击炮受到抗日武装官兵广泛青睐,并在官兵手中屡建奇功。1937年,参加平型关战役的八路军第115师343旅迫击炮连,仅拥有4门以前缴获的民二十式82毫米迫击炮。该炮由南京金陵兵工厂在1931年参照法制布罗德M27式迫击炮和上海

兵工厂仿制的英国斯托克斯式迫击炮设计制造而成。战斗中,该连官兵用这4门迫击炮配合步兵,成功抵挡住日军的反扑。在1939年的黄土岭战斗中,炮手李二喜也是使用82毫米迫击炮,在较远距离一举狙杀了日军中将阿部规秀,有力地鼓舞了抗日士气。

抗日战场上,像李二喜这样的神枪手很多。比如,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4团1营2连的张效文,也是神枪手。1943年7月,张效文在一次战斗中,一炮干掉了藏在距离500米处一棵大树树杈上的3个鬼子暗哨,为消灭其他鬼子创造了条件。毛泽东同志亲自签发命令授予“神枪手”光荣称号的赵章成,则创造了在抗日战场上用20发“辣椒面炮弹”拿下日寇碉堡的传奇。

这些神枪手,靠什么打出这样如有神助般的弹道?除了苦练本领,别无他途。

九二式步兵炮是日本1932年研制成功的70毫米口径火炮,既能平射也能曲射,最大射程3000米,在山区复杂地形,可拆卸开来由10个人背负着机动。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缴获了一门九二式步兵炮,马上用于战斗。1944年初,新四军第16旅48团也曾从一队日伪军手中夺得一门九二式步兵炮,并用它演绎了又一段传奇。1944年10月,该团攻打白鱼埠据点,伪军仗着坚固的防御工事拒不投降。新四军指挥员挥手拉出了这门火炮。伪军见状立即不战而降。此后,这门步兵炮跟随48团转战大江南北,创造了辉煌战绩。

在抗战过程中,八路军尝试逆向仿制过九二式步兵炮,直到抗战结束后才完成试制。在此期间,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主要依靠缴获来获得火炮,到抗战中后期我们才拥有了能够制造迫击炮等部分重武器的能力。



“50小炮”。



黄土岭战斗中用过的82毫米迫击炮。



九二式步兵炮。

弹药虽缺,颗颗填满斗志



“中国的保尔·柯察金”吴运铎。



黄崖洞兵工厂生产的部分枪械。



德制木柄手榴弹。

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冉庄地道战的民兵李恒彪,在回忆录里写了一段从敌占区找回自己落在老乡家里的6颗子弹的故事:因为当时获取子弹太难了,身为爆炸排排长的他,先后3次请示县游击连连长,最终涉险取回了子弹。

子弹短缺,当时并不只是冉庄民兵要面对的问题。确切地说,全民抗战爆发后,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普遍面临着弹药短缺问题。在这种情况下,各根据地的兵工厂纷纷加大了生产子弹、手榴弹和各类炮弹的力度。

1940年6月,晋察冀军区成功试制硫酸、硝酸和无烟药等化工产品,解决了制造高级火炸药的技术难题。1940年底,八路军采用白生铁钝化技术,部

分解决了炮弹毛坯材料缺少的问题。化学技术和冶金技术的突破,为根据地兵工厂大量生产子弹和炮弹创造了条件。

当时,各根据地兵工厂大多以复装子弹为主。因为与制造新子弹相比,复装子弹所需工艺相对简单。但细细研究那段历史就会发现,复装子弹也并不容易,难就难在运动战、游击战中弹壳难以收集,而且弹头材料也较难获得。这种情况下,我党显示出强大的动员能力,多渠道解决问题,推动了弹药产量快速增长。1940年,八路军复装子弹年产15.3万发,到1941年就提升到40.35万发,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弹药消耗造成的缺口。

对于缺少少炮的敌后抗日武装来说,手榴弹是步兵手中可靠的支援武器。除了战场上缴获外,各根据地兵工厂也进行了仿制生产。比如,八路军改良了当时普遍装备的德制木柄手榴弹,使其构造更加简单,生产周期更短,很快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推广。

第129师还仿制生产过晋造木柄手榴弹,分为大、中、小3种型号,以适用不同作战场景。与此同时,根据地各兵工厂简化工艺流程,想方设法就地取材,从而使手榴弹的产量明显增加。

以百团大战为例,这次战役中,八路军共消耗子弹70多万发,炮弹逾1.7万发,而手榴弹消耗达到惊人的12万发,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弹药消耗造成的缺口。

对于缺少少炮的敌后抗日武装来说,手榴弹是步兵手中可靠的支援武器。除了战场上缴获外,各根据地兵工厂也进行了仿制生产。比如,八路军改良了当时普遍装备的德制木柄手榴弹,使其构造更加简单,生产周期更短,很快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推广。

迫击炮炮弹是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杀敌重拳,因此迫击炮炮弹成为各根据地兵工厂的研制重点。

在我军先后突破了制造硝化棉、硝化甘油等技术难关后,迫击炮炮弹的射程、穿透力、爆炸威力和生产数量也随之增加。

据统计,整个抗战时期,八路军生产了“50小炮”炮弹20多万发、82毫米迫击炮炮弹数千发,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弹药短缺的问题。

数字背后,历史铭记着更多感人细节。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,我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吴运铎带着学徒,全力以赴为前线生产弹药。1942年,吴运铎接到前方急需炮弹的任务,他带领同志们连夜为废炮弹除锈、填药、安装弹尾等。

因为缺原料,制造不出雷汞,吴运铎冒着生命危险从雷管里挖取雷汞。雷管在他手中爆炸,炸裂左眼晶体,炸伤左膝盖,炸掉左手4个半指头……

“既然是战斗,总有牺牲者,不是我,就是别人。只要我活着一天,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。”像吴运铎一样,很多兵工工人在这样做。

通过革新迫击炮弹套口专用设备,韩忠武将工效提高了数十倍;经过7天冥思苦想,石成玉终于造出了麻尾弹,后又与战友一起仿制发明了燃烧弹、烟幕弹、滚雷等20多种地雷和专用弹。不少兵工人在拆炮弹、试雷管等事故中牺牲在工作岗位上。

正如晋察冀军区兵工烈士纪念碑碑文所写:“诸位烈士,由于你们的流血牺牲,给中国人民换来幸福生活,于世界人民争下和平,为民而死,虽死犹荣。”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是无数先辈以生命为刃,劈开了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的黑暗,迎来了中华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胜利曙光。每一件兵器的获得,每一场战斗的胜利,都凝聚着先辈们的热血与牺牲,浸透着先辈们的大无畏精神。

供图:阳明
版式设计:方汉